

论新时期中国涉外婚姻的特征与走向

——以上海市为例

丁金宏 杨鸿燕 周少云 周吉祥 林克武 张玉枝

【摘要】 中国的涉外婚姻起步晚,发展快,经济开放使上海市成为中国涉外婚姻发展最快的地区。在上海市的涉外婚姻中,外国男性娶上海市女性的“顺势组合”占绝对优势,婚姻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离婚者参与涉外婚姻的情形比较普遍,显示了这类人群婚姻观念的开放性;平均结婚年龄高,外嫁婚姻的夫妻年龄差距过大;涉外婚姻的受教育程度高,属于文化优势阶层。涉外婚姻存在商业化倾向,感情基础相对单薄。涉外婚姻的过快增长宏观上也造成上海本地婚配人群的素质错位。涉外婚姻的未来目标是平衡、平等的国际家庭。

【关键词】 涉外婚姻 结构 模式 上海

【作者】 丁金宏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杨鸿燕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少云 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吉祥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处长;林克武 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张玉枝 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

中国的涉外婚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涉外婚姻是指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包括外籍华人)之间的婚姻,这类婚姻又称为跨国婚姻。广义的涉外婚姻既包括跨国婚姻,也包括中国内地公民与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公民之间的婚姻。后者的婚姻当事双方虽然都是中国公民,但非内地一方往往覆盖于另一种婚姻法律体系,因而这类婚姻通常也被视为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的缔结地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境外或者第三地,由于国际私法和中国民法都尊重和承认婚姻缔结地法律(戴小冬、徐峙,2001),从“属地化”意义上看,讨论中国的涉外婚姻问题主要应当关注在中国内地登记的涉外婚姻,本文所论是在上海市登记的广义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的当事双方通常属于不同的种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持有不同的语言,所以经常又被描述为“跨种族婚姻”或“跨文化婚姻”。西方社会学家把“是否愿意通婚成为亲戚”作为衡量两个种族之间的“社会距离”的首要指标,足见通婚对于增进种族和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曹云华,2001)。然而,在涉外婚姻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妇女的受伤害、婚姻中介的欺诈、非法移民、离婚等问题,此外还有国际间的婚姻法律衔接和管理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大城市涉外婚姻的规模与日俱增,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涉外婚姻的发展更为迅速,分析和总结上海涉外婚姻的趋势和特点,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城市的社会演化和社会开放性具有前沿意义。与此同时,涉外婚姻中日益显现的社会问题,也需要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部门加以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上海市近年来涉外婚姻基本数据的分析,揭示涉外婚姻中的一些社会倾向和管理问题。

一、中国的涉外婚姻来得晚,增长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的涉外婚姻几近绝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步进入对外开放时代,涉外婚姻也才悄然萌动。1978年,当辽宁的一位大学毕业生与一位法国女留学生申请结婚时,地方政府因找不到法律依据不得不向民政部上报请准(马役军,2001)。198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的专门法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

记的几项规定》，随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国公民与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同胞之间的婚姻管理有关规定，涉外婚姻的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

据统计,1979年全国内地涉外婚姻总数为8460对,2001年增长到7.9万对,22年增长了8.3倍,年均增幅接近10%。相比之下,同期全国登记结婚的总对数却是稳中有降,涉外婚姻在全国结婚总量中的相对比重由1‰量级增长到1%量级,说明中国的涉外婚姻起步虽晚,但走势迅猛(见图1)。

二、上海市涉外婚姻与经济开放的密切互动,在波动中快速增长

1980年以来,上海市涉外婚姻经历了“增长—稳定—快增—波动”的变化过程。1980年,上海市涉外婚姻登记数只有396对,占当年婚姻登记总量的0.2%,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程推测,这应该是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1980~1985年出现了涉外婚姻的第一次稳定增长,1985年涉外婚姻增加到826对,比1980年增加1倍多;1986~1988年涉外婚姻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数量稳定在每年800对左右。

1989~1992年是上海市涉外婚姻增长最快的时期,由1988年的802对猛增到1992年的2555对,年均增长33.6%。1993和1994年短暂平稳后,1995年增长并突破3000对,此后便在3000对上下波动,2001年达到3442对的最高水平,2002年又大幅度下降到2690对,占婚姻登记总量的比重达到3.0%,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超过开放程度很高的广东省(中华女性网,2002)。

近20年上海市涉外婚姻的增长变化与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1980~1989年上海市实际吸收外资的数额连续增长,来上海投资和工作的境外人员不断增加,中外人员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多,大大增进了中外人员的相互了解和认可,从而引致此后几年涉外婚姻的持续快速增长。1996年以后,国外投资都进入“高位震荡”时期,涉外婚姻也就在3000对上下波动(见图2)。涉外婚姻的发展说明,上海市不仅是经济开放,而且社会也变得更加开放。经济开放为婚姻开放提供了条件,但婚姻开放程度并不是简单呼应经济开放程度。比如1992~1996年上海市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外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同期的涉外婚姻并未完全响应这一趋势,只有小幅增长。就图2中的曲线形态来看,许多年份吸引外资的变化似乎还滞后于涉外婚姻数量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两年左右的“时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涉外婚姻为代表的社会开放与经济开放之间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社会”的关系,而是积极的互动关系(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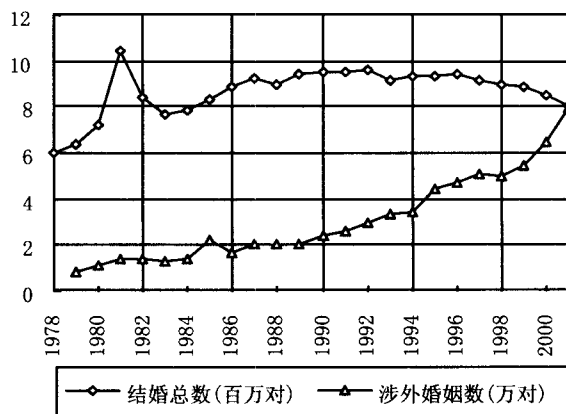


图1 1978年以来中国结婚总数与涉外婚姻数变动对比

注:1981年结婚总数激增系因该年初启用“新婚婚姻法”,确立了准婚年龄的权威性和晚婚的自愿性,覆盖了此前各地方、单位施行的近乎强制的晚婚规定,导致平均结婚年龄下降,结婚人群扩大。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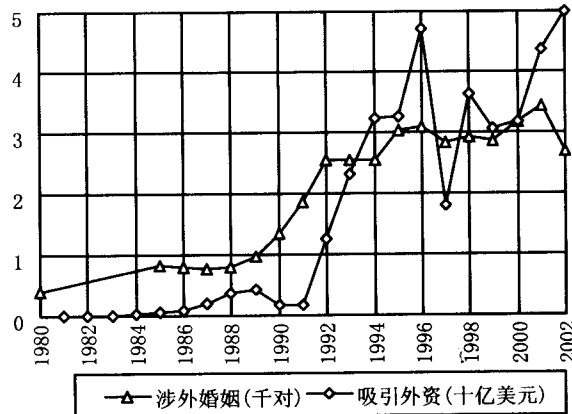


图2 1980年以来上海市涉外婚姻与吸引外资的变化对照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2)》、《200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上海市民政局2002年婚姻民政统计资料。

三、“顺势组合”的外嫁婚姻占绝对优势

为表述方便,我们称外方男性娶上海市女性为“外嫁婚姻”,上海市男性娶外方女性为“外娶婚姻”。

外嫁婚姻是涉外婚姻的主体。在1996~2002年登记的21 000多对涉外婚姻中,外嫁婚姻占88.9%,而外娶婚姻只占11.1%。这种性别差异模式与上海市居民跟国内其他省区人口结合的“两地户口婚姻”模式恰恰相反,在两地户口婚姻中,外娶(自其他省的)婚姻占了91.6%的绝对优势(丁金宏等,1999)。这种反差形异实同,中外通婚优势在外,城乡通婚优势在城,优势之男娶弱势之女,是为“顺势组合”,其量必多;而弱势之男娶优势之女,是为“逆势组合”,其量自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男强女弱”仍然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婚配模式,反映了女性的平均地位仍然低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四、外方人员中的外籍人员比重不断增加,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表1 上海市涉外婚姻中的外方人员构成的变化 %

外方国籍	1996年	2002年
合计	100.0	100.0
华籍	52.1	31.6
华侨	23.7	12.9
港澳同胞	12.6	5.8
台湾同胞	15.9	12.9
外籍	47.9	68.4
外国人	38.3	50.6
外籍华人	9.6	17.8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1996~2002年涉外婚姻统计资料。

表2 2002年上海市涉外婚姻中的外方人员国籍构成

国家/区域	人数 (人)	比重 (%)	国家/区域	人数 (人)	比重 (%)
总计	2690	100.0	北美洲	346	12.9
华籍	850	31.6	美国	241	9.0
华侨	347	12.9	加拿大	105	3.9
台湾省	346	12.9	大洋洲	176	6.5
香港特别行政区	146	5.4	澳大利亚	165	6.1
外籍	1840	68.4	欧洲	154	5.7
亚洲	1156	43.0	其他	8	0.3
日本	1065	39.6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2002年涉外婚姻统计资料。

外方人员按照国籍可分为外籍和华籍两大类,前者包括外国人和外籍华人,后者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地区公民。1996年以来两类人员的总体趋势是外籍人员规模不断增长,而华籍人员规模不断减少。1996年外籍人员比重为47.9%,还略少于华籍人员,但2002年增长到68.4%,相当于华籍人员的两倍。这种消长变化说明,上海人在涉外婚姻中越来越看重“真洋人”,涉外婚姻走向“国际化”(见表1)。

外方人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是外方人员最集中的来源地,2002年达到1 065人,占外方人员总量的39.6%;其次是中国台湾省,占12.9%;再次是美国,占9.0%,还有几个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6.1%)、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5.5%)和加拿大(3.9%)(见表2)。

交往机会和文化认同程度是涉外婚姻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因素,而交往机会的多寡受空间距离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程度的制约。上海人与日本人的大量通婚主要是由于日本是与中国距离最近的发达国家,与上海市有着密切的经济合作,这给中日人员交往

创造了大量机会。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地区同胞与祖国大陆有着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加上越来越频繁的经济交往,使这类涉外婚姻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比重。西欧、北美和澳洲虽然与中国距离遥远,但其发达的经济弥补了距离的影响,加上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合作,这类婚姻在涉外婚姻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五、离婚人员参与涉外婚姻的情形比较普遍,显示了这类人群婚姻观念的开放性

上海市涉外婚姻的婚前婚姻状况构成中,离婚的比重相当高,2002年男方为42.3%,女方更高达48.6%,而同年在上海市登记的全体婚姻中,这个比重男性为13.3%,女性为13.9%,不到涉外婚姻的1/3(见表3)。1997以来这一比重是逐年攀升的,其中女方上升尤快。在外嫁婚姻中,1997年女方婚前婚姻状况为离婚的占30.6%,低于男方的32.6%,但2002年已增加到47.8%,超过男性的41.3%。外娶婚姻中女方婚前离婚的比重1999年起一直高于50%,超出男方5~10个百分点。

离婚之后投入涉外婚姻的普遍性可能有三方面的解释。(1)频繁的跨文化接触是涉外婚姻的重要前提,而具备这种能力者大多有过出国、出境经历或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已婚者居多,所以离婚再婚的比重大。(2)许多涉外婚姻当事人经常或长期生活在国外、境外,离乡背井、夫妻分离的环境,也容易导致原先的婚姻裂变,促成了涉外婚姻。(3)参与涉外婚姻的人婚姻观念开放,在比较利益驱动下,更愿意抛弃自己原先的家庭投入新的跨国、跨境婚姻。离婚率上升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涉外婚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趋势,对开放城市的家庭稳定和婚姻观念产生不小的冲击。

六、平均结婚年龄高,外嫁婚姻的夫妻年龄差距大

涉外婚姻者的平均结婚年龄都显著偏大。在2002年外嫁婚姻中,外方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43.0岁,上海市女性为32.9岁,分别比上海全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高12.6岁和5.8岁。外娶婚姻的平均年龄也较大,男女双方都超过37岁。

造成涉外婚姻结婚年龄偏大的原因,首先是初婚者的结婚年龄偏大。外嫁婚姻中男性初婚者的平均年龄达37.8岁,女性为27.8岁;外娶婚姻中男女初婚年龄都超过32岁,显著高于上海市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其次,离婚参与涉外婚姻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属于再婚,年龄自然偏高。

2002年外嫁婚姻的夫妻平均年龄差距达10.1岁,其中13.0%的夫妇年龄差距大于20岁,年龄差最大的达到45岁,男方为87岁的美籍华人。外娶婚姻的男女年龄差距只有1.3岁,小于上海市民的平均水平(见表4)。

上海市涉外婚姻不仅表现出男女平均结婚年龄的显著不同,而且具体的年龄分布模式也因婚姻类型而异。在外嫁婚姻中,外方男性从25岁到54岁都有较大数量;而与之婚配的上海女性主要集中在20~

表4 2002年上海市不同婚姻状况的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差异 岁

婚前婚姻 状况	涉外婚姻						全市婚姻		
	外嫁婚姻			外娶婚姻			男	女	年龄差
	男	女	年龄差	男	女	年龄差			
合计	43.0	32.9	10.1	39.0	37.7	1.3	30.4	27.1	3.3
未婚	37.8	27.6	0.2	33.8	32.3	1.5	28.0	24.8	3.2
离婚	49.0	38.1	10.9	43.9	41.8	2.1	41.5	37.8	3.7
丧偶	57.5	46.4	11.1	58.5	45.1	13.4	55.8	48.9	6.9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2002年民政婚姻登记和涉外婚姻登记资料。

39岁,峰值出现在25~29岁。外娶婚姻双方的年龄分布比较一致,在20~49岁年龄段都有较大的数量。

就个案而言,只要感情基础牢固,婚姻双方的年龄差距无可非议,但是,如果群体统计显著偏离常态,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倾向。上述年龄差异模式清楚地表明,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具有强大的身份优势,可以吸引年轻的上海市民。对内地女性而言,以“青春兑换洋婚”的做法难免让人感叹。

从时间上看,涉外婚姻的平均结婚年龄是逐年上升的。1996年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40.0岁和31.0岁,到2002年分别增加到42.6岁和33.5岁,平均增加了2.5岁左右。造成涉外婚姻的平均结婚年龄逐年上升的原因正是前述的离婚后参与涉外婚姻的比重的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离婚参与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涉外婚姻的婚前婚姻状况模式逐步趋向一种稳定结构,因此,结婚年龄增大的过程也可能就此画上句号。

七、涉外婚姻者的受教育程度高,属于文化优势阶层

上海市涉外婚姻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而且外方人员高于上海市居民(见表5)。

表3 2002年上海市登记的涉外婚姻与全市婚姻的婚前婚姻状况对比 %

婚前婚姻 状况	涉外婚姻		全市婚姻	
	男	女	男	女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未婚	55.0	49.6	84.4	83.9
丧偶	2.8	1.7	2.3	2.2
离婚	42.3	48.6	13.3	13.9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2002年婚姻统计资料。

表5 2002年上海市涉外婚姻者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

受教育程度	涉外婚姻				全市婚姻	
	外嫁婚姻		外娶婚姻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研究生	4.6	1.5	3.4	2.2	0.5	0.1
大学	57.5	28.2	31.8	42.9	15.5	7.6
高中	27.8	55.5	53.7	44.4	19.0	17.4
初中及以下	10.2	14.8	11.1	10.5	65.0	74.9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2002年民政婚姻登记和涉外婚姻登记资料。

从表5看出,无论是外嫁婚姻还是外娶婚姻,其参与者都是具有很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士,属于社会中的上海“文化优势阶层”。这反映了涉外婚姻对参与者文化素质的选择性,这种素质既包括达成涉外婚姻所需要的文化交流能力,特别是语言交

流的能力,也包括心理上的“包容力”,必须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跨文化、跨种族婚姻。

八、结语:走向平衡、开放、平等的国际家庭

中国的涉外婚姻已经由稀有变为常见,这是中国走向开放、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个缩影,千万人通过涉外婚姻组建国际小家庭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逐步融入了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但是,涉外婚姻毕竟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在发展中还存在某些不健康的倾向。首先,涉外婚姻的感情投入普遍比较单薄,婚姻基础不牢。这一问题在国内外有广泛报道,本文前述的离婚人员参与涉外婚姻的普遍性也说明了这类人群婚姻观念的现代性、世俗性。有的白领女士视情感如同儿戏,以婚姻为“跳板”,嫁给比自己大很多的外国人,以达到出国的目的,出国不久就离婚。这类“跳板”婚姻在上海人与日本人的通婚中尤其常见,其他地区的情形稍好些(李黎,1996)。其次,涉外婚姻的商业化倾向严重。国外许多网络专门经营“中国新娘”,其中绝大部分是推介中国未婚、离婚妇女,且来源大多为中国大陆地区。中国虽然明令禁止中介机构经营涉外婚介业务,但是网上国内有关“中国新娘”的婚介站点数不胜数,这一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涉外婚姻和两地户口婚姻相互挤压,造成上海市居民婚配素质错位。由于涉外婚姻大多是上海市高层次女性外嫁,而两地户口婚姻又以外地女性嫁入为主,后者的文化层次明显低于上海市女性的平均水平,这种“置换型”的婚姻流动使上海市婚姻年龄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层次降低,居民婚配双方的文化程度差距拉大,长期发展会影响地方的宏观婚配平衡。

伴随着经济、社会不可逆转的开放进程,中国的涉外婚姻数量还将继续增加,地域范围也将继续扩大,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未来涉外婚姻的比重也许会从目前的3%增加到5%,甚至更高。我们所担忧的不是数量、比重的增减,而是结构的不平衡和身份的不平等。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们有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更加平衡、夫妻更加平等的国际家庭。

参考文献:

- 曹云华(2001):《从族际通婚看泰国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东南亚研究》,第2期。
- 戴小冬、徐峙(2001):《论国际私法中的跛脚婚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丁金宏等(1999):《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以上海市为例》,《人口研究》,第5期。
- 李黎(1996):《上海市涉外婚姻的特点和问题》,《社会学》,第3期。
- 马役军(2001):《中国涉外婚姻十年回望(1978~1989)》(<http://www.jnsy.org/200104>)。
- 《涉外婚姻频亮红灯——广东东莞女孩淡出“外嫁潮”》,中华女性网(<http://www.china-woman.com/gb/2002/05/29/zgfnb/wspxw/4.htm>)。

(责任编辑:朱萍)

the migration rate curves differ significantly by sex.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al level, population moving polic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have strong impacts on the model migration schedule.

Study on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Once Family Planned Elderly Couples in Rural China

Li Jianmin • 40 •

Traditional arrangement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s built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 exchange of economic resources within family. This traditional arrangemen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faster economic,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Because the human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once family planned elderly couples has been slashed, the probability of poverty for these couples will increase greatly,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imely implement effective supporting policies. It is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which reduces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c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elderly family planned couples in rural areas, so the government has responsibility to institutionalize a mechanism in securing them.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for the family planned couples in rural areas is the best way to compensate the loss of the couples due to complying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Urban Population of Baoshan and Jiad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You Huansun • 49 •

The evidences provided by this article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of Baoshan has started a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type, while that of Jiading still kept a traditional styl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 requires a great conglomeration of economic energy before the full growth of commercial enginery.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and Its Public Service in Tibet: Sevenscases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 *Zha Luo* • 57 •

With the exemp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desired in accordance with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welfare service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in the area is able to combine the villagers' willingness and the government's tasks. This also makes local public services better meet the villagers' basic needs. Through examining the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the major providers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Tibet. Despite the insufficiency of resources,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still, with the help of Lamas and local celebrities, gain a wide support so that the villagers can enjoy timely and effective public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ross-Nation Marriage in Modern Shanghai

Ding Jinhong and others • 66 •

Although started late, cross-nation marriage has developed quite fast in China. Shanghai is one of the areas with more cross-nation marriages. There has appear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numbers of cross-nation marriag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ity. The majority of the couples are in the "lean style" with Shanghai females marrying overseas males. Nearly half of the correspondents are remarried after divorce. The average age at the marriage is relatively old, while the age gap between the couples is larger. These couples belong more or less to well-educated upper strata. In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there are more trading and even cheating than true love.

A Review of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Program: Problems and Policy Options

Yang Lixiong • 71 •

The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program initiated in China in 1993.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development, a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urban poor has been basically ensured. However, the program is not sufficient in supporting the urban poor since it is bond to emphasize the subsistence issue but not the development issue. Implementing the social policy of eliminating social exclusion therefore is urgently needed.